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香港模式与 台湾前途



潘国华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香港模式与 台湾前途

潘国华 主 编

李义虎 副主编

张植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 / 潘国华主编.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5

ISBN 7 - 5078 - 2362 - 8

I . 香... II . 潘... III . 台湾问题—研究
IV . 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394 号

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

主 编	潘国华
责任编辑	何 清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53304[传真])
社 址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2 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63560939 88541279)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4 年 5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78 - 2362 - 8 / D · 95
定 价	19.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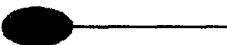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面意见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坚持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特色。

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离不开共性，但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这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常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应强调国家特色。何谓特色？它指的是独特、特质、开拓创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就是突出鲜明个性，从各自角度，观察国际社会，依据与时俱进，探讨客观发展规律，说明新问题，提出新思维，得出新结论。特色是学科的灵魂。缺少灵魂的学科，毫无用处。特色总是同整体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显现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不是脱离整体和普遍性而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要求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它拒绝的是教条式地全盘照搬，也反对否定一切，要求在继承和比较中创新。

国际问题作为学科研究，英、美、法三国最早，距今 83 年。特别



是美国的学科建设最为兴旺发达，仅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三次大的论战和无数次小的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流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在探索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新建树，但都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现了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特色，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国情、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原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地球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国常强调上帝赋予的“使命感”，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美国的各学派和学者深受熏染，无不打上深深烙印，呈现鲜明的美国特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最早在中国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始正规地、系统地培养专业人才。应该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晚于美国。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国情和文化传统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张的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派和学者，应该自立于世界国际问题研究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应有自己观察世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弄清“权利政治”核心，从新的视角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但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始

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强权，维护人权、主权与球权，充实完善人权、主权与球权，使三权相辅相成，实现完整的统一。

权利，主要表现为人权、主权、球权，均属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主权是国家的正当权利，球权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

从历史渊源看，人权思想问世在先，主权法定最早，球权也因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而随后登上国际舞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法定了主权又宣布了球权的诞生。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正式法定了人权与主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各国的人权与主权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国内法扩大为国际法，国际社会的球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涉及领域由少到多，不断拓宽扩展，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清算战争罪行的大前提下，妥协、协调，既维护主权又对等转让主权的结果。一部国际关系史，既是战争与和平史、大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关系史，也可以说是球权演变史。

球权管理的是国际事务，主权管理的是国家事务，虽然球权没有主权的权威性大，但当今世界球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且越来越大，它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

迄今为止，在球权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获取了更多利益，各国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从没有真正平等过。

但应当承认，球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提供了维护主权，实现发展的强有力保证。虽然球权的局限性大，主要以实力为

依据。但在公认的游戏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国际行为规范在所有国家都适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主权国家应当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行使球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利；但要加强团结，努力发展自己，既遵循球权，按球权办事，又要改革球权，使其不断充实完善，用球权维护主权和人权。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既百花齐放，又日益走向统一。但不是统一于世界政府和霸权领导，而是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主权和人权的同时，必须承认球权，把它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使主权既同人权，又同球权科学地统一起来。主权、人权、球权是紧密相联而活动于国际舞台的，既不能轻视其某一权，又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三权的相互关系是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是重视球权的时候了。任何损害球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三权科学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研究国际问题。权利政治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完全不同，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第三、抓住首要问题，科学界定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三定”：定位、定向、定标。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颇有见地。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问题学，或国际问题研究，就是“己学”与“彼学”的结合，更需要知己知彼。国际问题研究中为什么要知己知彼？简单地说，就是给国家定位。因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谁是敌国，谁是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同谁对抗，同谁合作？必须进行科学的定位，并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当前，必须正确判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危险，研究主要打击目标。同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冷战后的霸权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同社会制度相联，作为世界敌国对待，而是属于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有霸反霸，不涉及其他，这是正确的做法。“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上升为世界公害。它与世界各国为敌，肆无忌惮地残害人类，既践踏人权，又危害主权，也无视球权，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必须有恐反恐，有霸反霸。

历史是一面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全球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最终联成一体，全球范围的国际问题开始出现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国际社会舞台。迄今为止，国际问题的发展演变，均以世界经济政治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权益运转，主要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1）殖民主义体系形成与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2）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3）法西斯主义猖獗与反法西斯斗争时期；（4）两霸争夺与反霸权主义斗争时期；（5）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存与反恐反霸时期。从国际问题发展演变的五个时期中，我们发现有三个规律性的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际问题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始终不变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国际问题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转，表现为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规律性现象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向”：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新时期影响全局的主要危险。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

家间长期共存，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讲话在理”，说话办事要有准绳。当今世界，观察国际形势，判断国际是非，需要新的“定标”。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名正言顺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际事务只能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不能屈从于霸权，而应遵循球权，因为球权是以主权和人权为基础的，最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关键之处在于球权同人权、主权的统一。

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标”，从来就是“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破旧思想、旧认识、旧判断，破落后于实际或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认识和判断，又立与实际一致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与时俱进”需要转换脑筋。

现在是转换脑筋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2年6月22日
于北大兰旗营小区

前　　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国国家统一进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这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香港回归是在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下成功实现的。在整个回归过程中，我们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形成了一套完整配套的做法，即香港模式。

在香港回归后，人们自然会想到台湾问题的解决，想到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想到中国所面临的实现国家完全统一问题。作为祖国统一的第三步，台湾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均日益增加。人们还把注意焦点放在香港模式与台湾问题解决之间的联系上，注重研究香港模式对台湾前途的影响，并且在国家统一模式和方案上进行有益的探索。

正是在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时刻，正是在台湾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的时候，1997年，我们以“香港模式和台湾前途”为题向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研究课题，并得到了批准。申请这一课题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依据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和国家统一理论所取得的重大发



展，系统总结在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香港模式，总结它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阐明它之所以作为“统一模式”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研究它所涉及的有关国家统一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统一模式的理论。同时，或许是更重要的，我们把研究的主要兴奋点和焦点放在了对于台湾前途的探讨上，从国家统一模式的高度上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合理途径和方案。

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为此我们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专门从事台港澳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为主，组成了课题的研究组，并在五年多时间内进行了深入、全面和系统的研究。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现在《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一书已经完成。本项研究特别注意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之间的关系与性质，本课题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调课题研究的时代性。作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课题，《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一书注重在香港回归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研究问题，并且重视香港问题解决的成功经验对台湾问题解决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同时，在十分关注台湾问题解决前景的背景下，重视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由此带来的其解决方法的特殊性。我们认为，既要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的立场；又要以江泽民“台湾问题解决可以更宽松”和八项主张中分步骤分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为指针。

第二，注重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辩证性。《香港模式

与台湾前途》一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注意在国家统一理论的层次上看待问题，又注意观照香港回归的实践和两岸关系发展中的现实。由此，课题把有关国家统一的实践行动和政策与有关国家统一的理论兼顾起来，在一定的理论背景下，特别是从比较的角度来说明问题。

第三，注意研究的创新性。也就是从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研究观点，以期得到新的研究结论。特别是对于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研究，更需要确定新的研究角度和进行“范式的转换”。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也只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学术努力，肯定有不尽成熟和周详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工作只是希望能够引起台湾问题和统一问题研究领域在研究探索方面的某种共鸣，而起到“铺路石”的作用。

本书共分十章。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重点研究香港问题解决过程中所形成的“香港模式”，系统总结分析了“香港模式”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及其在祖国统一整体进程中所占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从第六章到第十章研究重点转向对台湾问题解决的探讨，在研究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台湾及海内外各种“统一方案”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归结点放到了有关台湾前途的“中国和平统一模式”之上。我们既注重了“一国两制”模式的研究，包括对这一模式的各种理论性反应，又注重了多种非“一国两制”模式的比较鉴别。这拓展了我们研究台湾前途问题和中国和平统一问题的视野，同时也坚定了我们对中国和平统一前景的信心。我们认为，对于



中国和平统一模式的开放式学术探讨，有助于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有助于在实践中推进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也有助于给学术探讨和政策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应该指出的是，在我们进行本课题研究五年多时间里，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都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在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台湾问题则几经曲折，变化起伏，成为引起国人注意的热点问题，也成为国际间关心的焦点问题。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对两岸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出了危险的一步；这也引起了继1995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新的一场两岸关系危机。2000年3月18日，台湾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新领导人。2002年8月，陈水扁鼓吹“一边一国”论。这使两岸关系发展增加了新的复杂的变数，中国和平统一进程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陈水扁和新台湾当局否定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渐进式台独”。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平统一模式经历着历史性的考验；而这种历史性的考验要求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模式进行更深入、更系统和更具体的研究。

“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的课题研究，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理论上的挑战和刺激；经过这项课题研究，

我们感到自己和历史行进的脉搏十分贴近，也和眼前在台湾问题上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拉近了距离。但这只能更加启发我们进行研究的兴趣，并获得不断的鞭策和压力；这也是我们在五年多时间里具备的一种特殊的动力。

最后，我们希望《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一书能够得到同行们的指教和匡正。

“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课题组

2003年7月1日

香港回归祖国六周年纪念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祖国统一问题的缘起	(1)
一、香港问题的由来	(1)
1. 鸦片战争与英国割占香港岛和九龙	(1)
2. 英国强租新界	(4)
二、台湾问题的由来	(6)
1. 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产物	(7)
2. 美国因素	(8)
三、从历史与国际法看中国统一问题	(12)
1. 港台问题比较分析	(12)
2. 从历史文化看海峡两岸关系	(17)
3.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国际法依据	(21)
4. 驳“台湾地位未定论”	(23)
5. 从世界政治格局看中国统一问题	(26)
四、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统一的努力(1949 年前)	(29)
1. 解决香港问题的努力	(30)
2. 光复台湾的努力	(33)



第二章 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模式争论 (36)

一、亲英的诸种方案	(36)
1. 维持现状论	(36)
2. 中英续约或另立新约	(37)
3. 以主权换治权	(39)
4. 中英共管	(41)
5. “九七”后英国在香港保留特殊地位	(42)
6. 延长过渡期	(43)
7. 巴拿马运河模式	(44)
8. 英式“港人治港”	(46)
二、香港“自治、自决”方案	(47)
1. 新加坡式自治模式	(47)
2. 香港居民自决前途	(48)
3. 香港成为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49)
4. 联合国托管	(50)
5. 香港国际化	(51)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52)

第三章 香港模式的形成、内容与特点 (56)

一、新中国政府对港台问题的基本立场	(56)
1. 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56)
2. 对台湾：“一纲四目”	(61)
二、“一国两制”方针的由来	(67)
1. 香港问题提上议程	(67)
2. “一国两制”由构想到基本国策	(70)
三、香港模式的内容与特征分析	(72)
1. 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基本法	(72)
2. 香港模式的主要内容	(79)

3. 香港模式的特征	(84)
四、“香港经验”垂范,澳门问题圆满解决	(86)
1. 澳门问题的由来	(86)
2. 依据“香港经验”,圆满解决澳门问题	(87)
第四章 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变与影响	(95)
一、两岸关系的演变	(95)
1. 从军事对峙到政治对峙(1949 ~ 1979)	(95)
2. 走向缓和,局部开放,间接交流 (1979 ~ 1988)	(100)
3. 两岸经贸发展与政治僵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	(102)
4. 目前两岸关系之特点	(105)
二、两岸半个世纪隔绝的后果与影响	(108)
1. “制度之争”与“两岸统一经济差距论”	(108)
2. “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	(110)
3. 李登辉“宪改”增加了两岸关系的 复杂性	(113)
4. 两岸之争,反华势力得以渔利	(114)
第五章 李登辉主政时期对中国统一问题 的立场和主张	(115)
一、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蜕变	(115)
1. 李登辉执政初期与《国统纲领》	(116)
2. 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	(120)
3. “一个分治的中国”之提出	(126)
4. “特殊两国论”出台	(129)
二、台湾当局反对“一国两制”	(129)